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理

姚选民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湖南 长沙 410003)

摘要: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理的研究现状,内在吁求“回到事情本身”的马克思主义视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政理的核心要义在于:政治上,中国社会拥有极具吸聚力和动员力的先进、科学、合理的政治体制;经济上,中国社会的经济活动领域适度释放了“权利本位式”人民性格;文化上,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让人们“映显缺陷”和其“权利本位式”人民性格发挥积极作用的文化结构条件;外交上,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实力”外交思维为“里子”和以“怀柔”外交思维为“面子”的现代外交思维结构。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政理的核心要义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政理;“回到事情本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辩证唯物主义;人民性格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3)03-0019-06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3.03.003

The Political Governance of the Socialis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Yao Xuanmin

(Institute of Marxism, Hu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People's Government of Hunan Province), Changsha, Hunan 410003, China)

Abstract: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n the political governance of the socialis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lls for the Marxist perspective of "returning to the affair itself". The core essence of the political governance of the socialis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ies in: that politically, Chinese society has an advanced,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political system with great attraction and mobilization; that economically, the field of economic activities in Chinese society has moderately released the "right-based" character of people; that culturally, Chinese society has gradually formed a cultural structure that allows people's "reflection defects" and their "right-based" character of people to play a positive role; and that diplomatically, Chinese society has gradually formed a modern diplomatic thinking structure that takes "strength" as "implicit face" and "conciliation" as "explicit face". Therefore, revealing its core essence is the integral component of being determined to the confidence of the socialis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the socialis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olitical governance; "return to the affair itsel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he character of people

收稿日期:2023-01-21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重点课题(XSP20ZDI022)

作者简介:姚选民(1980—),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1]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下简称为“中国道路”)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历经千辛万苦、克服千难万险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于中国人民共同奋斗，扎根于中华大地，是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安宁的正确道路。”^[2]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已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发展成就，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如何解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持续快速发展这一世界级现象，成为当下海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已产出了关于中国道路的一系列研究成果。^①整体来看，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基于马克思主义向度揭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何能够成功走出一条中国道路的成因等主题，但更为整体和复杂的课题仍有待进一步探讨。因此，本文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政理^[3]的内涵要义和基本原因等进行解读时，“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1]，坚持“守正创新”、回到中国道路本身，亦即从“回到事情本身”的马克思主义视角出发，以期探求中国道路得以形成的深层内在逻辑。

一、中国道路政理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式”视角解读

海内外学者对中国道路政理的解读虽众说纷纭，但研究对象却共同指向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中国道路。有学者指出，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验与教训，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开创出了一

条切合中国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4]。应该说，这些研究文献虽然秉持马克思主义视角，但表现出的是一种“传统式”解读，即大多是程式化套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进行政理诠释。具体来说，主要是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四个基本维度来阐述中国道路的形成原因或内涵要义，^②试图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伟大成就的“基因密码”。

第一，从政治维度看，中国道路的政理是缘于中国共产党采用了特殊的政治体制，包括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要素。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会采用这一国家政治体制，主要是基于我国国情创造性地实践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以及我国当今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主要是因为政治领域，我党正确研判国内外政治局势并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

第二，从经济维度看，中国道路的政理是缘于中国共产党采用了特殊的经济模式，包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等。中国共产党基于我国国情创造性地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以及我国当今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主要是因为经济领域，我党基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

第三，从文化维度看，中国道路的政理是缘于中国共产党采用了先进的文化制度，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精神文化生活多样化等。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意识形态格局中，我党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国家立心，为民族

立魂,才能更好地捍卫我国的文化安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以及我国如今取得的巨大发展,主要是在文化领域,我党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第四,从外交维度看,中国道路的政理是缘于中国共产党吸收并借鉴了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包括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政策等。20世纪80年代,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我国国情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这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构想。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以及取得的伟大成就,主要是在外交领域,我党基于国内外形势变化,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以及我国取得长期稳定发展中发挥着至为关键的作用。其一,受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深刻影响而形成的国家政治体制,抑制了人们各顾各家的“小家庭”思维这一“映显缺陷”的负面作用,促成中国共产党选择具有强大吸聚力的政党—国家政治组织模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根本政治条件。其二,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为指导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适度释放了“权利本位式”人民性格的积极面相,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基本经济条件。其三,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有效抵御了西方文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致命性冲击,为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条件。其四,在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影响下,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成熟务实的现代外交思维结构,这成为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发展的外交条件。

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取

得今天的巨大成功,马克思主义可谓厥功至伟。同时,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元素,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性格等,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取得今天的成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道路政理的马克思主义“事情本身式”视角解读

现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政理解读的相关研究文献,大多聚焦对中国道路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方面进行原因分析,而鲜少对各要素的内在作用机理进行阐释。可以说,这些研究成果更多地是解释中国道路政理中的具体元素“是什么”,而对这些具体元素背后“为什么”以及“怎么做”等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进行中国道路政理解读时,现有文献着力解释了中国道路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领域的基本制度如何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但没有从更全面的视角来阐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当今中国取得巨大成功中如何发挥关键作用。为此,关于中国道路政理的解读,既要吸纳现有中国道路政理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式”视角解读中的合理成分,更要守正创新,从马克思主义“事情本身式”视角出发,回到中国道路本身,“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来进行解读。从马克思主义“事情本身式”视角解读中国道路政理,也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四个基本维度进行阐释。

第一,从政治维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因为中国拥有先进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具有强吸聚力和动员力。具体来讲,这种政治体制强吸聚力的形成可划分为两大阶段:一是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宏观转变,即从中国的“以家为中心”的家—国政治组织模式向国家政治组织模式转变。腐败

无能的晚清政府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节节失利的事实表明,在西方主导的现代国际社会,“以家为中心”的家一国政治组织模式中有关组织动员社会力量的理念和方式等已经落伍,当时以孙中山先生为主要代表的国家政治精英开始注意和被迫运用西方社会的政治组织模式——国家或主权国家的政治组织模式。清末鼎革后,在国际舞台上,中华民国赢得了一定的国际地位,遗憾的是,其整体形象仍然是软弱可欺的,因此,中华民族亟待构建一种强吸聚力的政治体制。尽管当时的国家政治组织模式在宏观层面趋向现代化,但仍难以抑制或扭转个体层面的“小家庭”思维,更不用说形成与现代国家政治组织形式相匹配或相适应的国家民族整体思维了。二是作为国家政治组织模式主导者的执政党,其组织形态从松散型向严密型转变。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吸聚力的强弱往往取决于国家的政治组织模式是否先进,以及取决于作为国家政治组织模式的主导者——国家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在时代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者以及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时,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领导力,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入党的程序科学,不是什么人都符合要求,也不是什么人想入党就能入党;另一方面,强调思想建党,要求所有党员真正实现思想上入党。形象地说,就是不仅身体要进党的门,即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且思想上也要入党^[5]。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有效抑制社会上存在的“以家为中心”的“小家庭”思维,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组织模式以及作为国家主导者的严密型执政党组织。从此,在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中,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具有社会动员能力以应对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挑战,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取得今天的成功的根本政治条件。

第二,从经济维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在经济活动领域适度释放了“权利本位式”人民性格。为了对内维护稳定的政治秩序、对外捍卫我国正当的国家权益,强吸聚力政治体制的形成能够有效抑制“以家为中心”的“小家庭”思维,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和自主。但是,将具有强吸聚力的体制模式完全搬进经济领域,多少会压抑人们既有的人民性格对经济活动的正向作用。中国人既有的人民性格缘于中国社会在进入世界历史过程中^[6]呈现出一种政治上的“映显缺陷”,即“以家为中心”的“小家庭”思维,它是既有的人民性格在新的历史时空中凸显的并非真正“缺陷”的负面因素。吊诡的是,在新的历史时空下的经济领域,中国人的这种“映显缺陷”呈现为一种“权利本位式”人民性格。这种“权利本位式”人民性格是以人们“以家为中心”的“小家庭”思维为基础的,而这种“小家庭”思维源自传统文化中的儒家伦理秩序思维。在这种伦理秩序中,每个人若尽了自己的本分职责,那么在其他行为领域是没有限制的,即他们都有行为上的自由权利。今天中国取得的经济发展与其社会成员“权利本位式”人民性格具有相关性,一方面,如果中国人“权利本位式”人民性格不被正确对待甚至被全面压抑,中国社会经济体就会长时间停留在小农经济或家庭经济“原地踏步”,如秦汉以来就始终跳不出小农经济形态;当然,如果对中国人“权利本位式”人民性格不加以约束,中国社会经济体就会演变为恶性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而“相互拆台”,如晚清民国时期社会经济形态^[7]。另一方面,若只是在现代中国经济领域释放部分国家经济精英的“权利本位式”人民性格,则整个中国社会经济体的发展可能会产生“天花板效应”,美苏争霸期间,苏联国家经济“匍匐不前”的情况^[8]亦可归结于此。不难发现,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经济体制上的顶层设计,若既能适度利用“权利

本位式”人民性格的优势,又能避免因放任“权利本位式”人民性格而产生的负面效应,整个中国社会经济体终将迎来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腾飞就说明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后我国确立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③适度释放了全体社会成员“权利本位式”人民性格,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取得今天的成功提供了基本经济制度条件。

第三,从文化维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逐渐形成的抑制人们“映显缺陷”和其“权利本位式”人民性格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文化结构条件。如前所述,在政治领域,中国社会不同程度地存在“以家为中心”的“小家庭”思维这种“映显缺陷”;在经济领域,存在具有或然性结果的“权利本位式”人民性格。所谓“或然性结果”主要是指,若有效发挥“权利本位式”人民性格的优势,对经济社会发展会形成推动作用,反之,则会造成阻碍。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形成良好局面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引领和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文化结构”。这种文化结构至少包含两大构成要素:一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源于中国并流传及影响至其他国家的文化体系;二是指俄国十月革命后传播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或意识形态^[9]。一方面,这种文化结构的逐渐成型,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能够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马克思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来抑制“映显缺陷”和其“权利本位式”人民性格等所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在总体上实现时代巨变所要求的中华文化自我调适。另一方面,出现任何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正向效应的因素,中国共产党人都会自觉调整相

应文化条件,如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引入以马克思主义文化意识形态为主要代表的新兴文化元素,就是“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10]。近现代中国积贫积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对主要凭靠军事实力耀武扬威的西方文明^[11],难以真正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在此情况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借鸡下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引进马克思主义文化意识形态元素^[12],从而消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霸权地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取得今天的成功提供了基本文化条件。

第四,从外交维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因为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推动下,逐渐形成了一种现代外交思维结构。具体来讲,就是我党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形成了一种“以我为主”的怀柔外交思维。“天下情怀”^[13]式怀柔外交思维的核心主张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甚或常常“以德报怨”。不过,经过晚清以来的时代巨变,原来的中华文化圈逐渐被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社会压制;原来中华文化圈的外交思维在国际社会具有一定影响力,却逐渐被威斯特伐利亚资本主义世界结构体系的外交思维所替代,后者是一种为西方社会所倡导或践履的“丛林”或“实力”外交思维^[14]。这种外交思维相较于原中华文化圈外交思维的最大特点是过于强调国家实力,常常赤裸裸地以外交活动主体,即国家民族的实力为准绳,特别看重国家的硬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15]。自中国逐渐融入现代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以来,这种外交思维上的时代“落差”可以说一直存在,自新中国成立直至实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外交思维仍奉行一种

以“以我为主”的怀柔外交,主张以自己的德行来赢得其他国家抑或敌对国家的尊重^[16]。不过,国家外交实践反复证实,这种外交思维带来的结果常常是我们正当的国家民族权益遭受损失,这刺激了国家政治精英群体对既往传统外交思维进行反思:国家外交活动的首要目标是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积极创造条件,在和平国际环境下持续发展并壮大自己,努力实现自己国家综合实力的快速增长。换言之,就是国家外交不是旨在维护所谓的“国家情谊”,如传统文化联系上的情谊或者是意识形态同源国家的情谊等。正是实现了外交思维的实质性转变,即从传统中国外交单纯注重国家间情谊向现代中国外交侧重壮大自己综合实力的思维转变,中国共产党人逐渐形成了一种现代外交思维。这种外交思维的基本内涵是:以现代社会盛行的“实力”外交思维为“里子”,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怀柔”外交思维为“面子”。可以说,自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已经逐渐转变为旨在快速壮大自己国家力量 and 努力提升自己国家的综合实力,其次才兼顾基于怀柔外交思维的国家情谊,一如邓小平所说的,“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17]改革开放以来所逐渐形成的现代外交思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取得今天的成功提供了基本外交方面的条件。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取得的巨大成功,不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领域任何单方面条件作用的结果,而是这些要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集聚效应。

三、结语

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术”,更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现有中国道路研究多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范畴,研究者对中国道路

政理的解读通常是马克思主义“传统式”视角解读,而不是以一种内含“两个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事情本身式”视角的解读。如果程式化套用马克思主义“传统式”视角解读路径来解读中国道路的政理,就难以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作为极为关键元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当今取得伟大成就中的重要作用。探求中国道路形成的内涵要义与根本原因的现状会不断吁求更深入、更全面的理论视角,而对中国道路政理内含“两个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事情本身式”视角的解读,就是拓展解读视角的一种全新尝试,以期系统、有效地揭示中国道路的内在运作机理,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本身来阐明中国道路政理的丰富内涵。

〔注释〕

- ① 参见高建《“中国模式”的争论与思考》,载《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3期,第72-85页;秦宣《“中国模式”之概念辨析》,载《前线》,2010年第2期,第28-32页;王庆五《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与中国经验》,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第5-12页。
- ② 参见支振锋、臧励《“中国模式”与“中国学派”:“人民共和国60年与中国模式”学术研讨会综述》,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4期,第140-148页;张博卡、简皎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丰富内涵与深层逻辑:第八届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论坛暨“中国共产党百年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载《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第134-136页;田玉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中国道路与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高端论坛综述》,载《理论视野》,2020年第9期,第93-94页。
- ③ 参见高尚全口述,萧冬连、鲁利玲整理《亲历中央若干重要改革文件的起草过程》,载《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6期,第21-37页。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2022-10-26.

(下转第139页)